

第四讲大一统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讲义系列

第四讲
大一统与
中国式现代化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本讲目录

引言

一、何谓“大一统”？

二、古代大一统的定律、逻辑与缺陷

三、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

四、比较视野中的大一统

五、数字大一统

本讲小结

第四讲

大一统与中国式现代化

引言

如果把存续时间长，可扩展，可借鉴，可复制作为标准，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些民族和国家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制度贡献，例如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法治与混合政体。英国为现代国家贡献的代议制、政党制度，议会制度、普选制度等，奠定了它作为“现代政治制度博物馆”的地位。记得英国学者塞缪尔·芬纳(Samuel E.Finer)在《统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一书中提到，官僚体制和常备军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但我们觉得官僚制和常备军制度还不足以揭示中华民族对政治文明的最大贡献，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那就是“大一统”，官僚体制和常备军制度不过是大一统衍生出来的制度成果，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以推动本国、本民族的进步，并不是件难为情的事，关键是为我所用面不失本色，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大一统并不涉及到太多的价值问题。大一统就是国家建构的基本事实和客观依据，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旦用其民族语言—德语—翻译《圣经》，以替代拉丁语版的《圣经》，拉丁语作为大一统的语言立刻受到严峻的挑战，本来就是松散的中世纪神权体系便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在当今世界，一些美国人特别以他们国家的多样性(**diversity**)面自豪，但是，美国的美元大一统，语言大一统，汉堡大一统、服饰大一统等很多方面，难道不是吸收了来自中国的大一统要素吗？在产品标准，生产技术、服务流程甚至空间布局诸方面，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苹果都是标准的缔造全球大一统的商业帝国。所以，凭借多样性来批判大一统是极为愚蠢的，任何国家要想谋求生存与发展，一定是在多样性与大一统的相互结合中寻求平衡，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解体有着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支撑现

代国家之大一统的特性在这些国家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于是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即便是以分权，联邦制作为立国基础，标榜多样性、多元性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毫无例外的吸收了大一统的原则与精神。相反，凡是没有吸收大一统原则与精神的国家，则暗含着顽固的分裂倾向和离心力量，清华大学杨雪冬教授在他个人微信号中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语言有‘殖民性’吗？”，雪冬教授在该文中写道：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1947年独立后的调查，有150多种语言，截至2024年，根据印度宪法第八附表，已有22种语言被归类为公认的语言。印度没有指定的国家语言，印度建国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政府采取了建立“语言邦”的措施，把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群划为一邦，尽管依然有18%的人口被分散在各邦之中，成为语言的少数派，但是基本上实现了一个语言群体一个邦的目标。1960年代中期，在语言邦建立后，印度政府确定了10多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印地语是国家的第一官方语言，并计划在20年后全面替代英语，除了印地语和英语，各邦也确定了自己的官方语言，多种语言的存在成为了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按照经典的民族理论，语言是辨别民族的重要标准之一，一种语言意味着一个民族。而每个民族在理论上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这不仅是西方经典民族理论的基本判断，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印度、非洲很多国家的大一统之路还非常漫长，实事求是的说，这些国家内部潜伏着持久的、顽固的分裂倾向，

中国与印度在很多方面可以形成比较分析的两极，一个包含着多重分裂倾向的国家只能依靠种姓制度，把每一个人固定在与生俱来的位置上，才能维持一种虚幻的统一局面，印度至今也没有统一的文字、语言、习俗，甚至像欧洲一些国家所具有的统一宗教都没有，这个国家只能依靠种姓制度牢牢地锁定住每个人的位置，这是其只能固守传统制度而无法进行社会革命、彻底实现现代化的原因。相反，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底盘就是大一统，可以说，如果没有大一统这个底盘，中国式现代化

杨雪冬《印度笔记(30)语言有“殖民性”吗？》，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oMSSXXjv3y7tn3p8WiPyAg>,

的所有成就都无从谈起，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来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大一统，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将会很容易被锁定在传统制度的铁笼中而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国家要想使自身成为一个统一的坚固的政治实体，要想通过统一的市场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就不得不吸收中国大一统的智慧，即使是以“多元性”(pluralism)为骄傲的欧美诸国，在实际上也都不自觉地吸收了中国的大一统元素，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是一个“汉堡”大一统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的饮食系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联邦制”，远不止八大菜系，再小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家乡菜与本邦菜。美国的服装也是西装“大一统”的，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语言大一统是其最大的政治资本，同样是英语圈国家，加拿大却无法做到美国事般的语言大一统，加拿大国内英语族群与法语族群的内在张力，是加拿大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政治议题，虽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但中国方言的多元化对大一统并没有构成损害，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大一统的，古代的“官话”大一统可以超越方言鸿沟形成政治沟通的媒介，于是，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表面上奉行分权与多元原则的国家，其背后往往是资本大一统和生活大一统，而政治大一统的国家，却可以在生活要素上允许百花齐放，争相斗艳，

一、何谓“大一统”？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根柢，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力量源头。钱穆先生曾提出过和平大一统的思想，不管是和平大一统，还是武力大一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手段和方式，而在于大一统作为一种思想、制度和实践，能否获得一种正统的地位，从而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延续下去，成为一种政治常态，为现代国家的诞生提供空间屏障和制度支撑，既然，大一统涉及到“大”、“一”“统”三个要素，那我们先分头讲起，尽管分开来讲不一定能完整理解大一统，但对三个基本要素的理解很是关键。

(一) 何谓“大”？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3-140页，

以概念内涵面论，大一统中的“大”既可作形容词，也可作动词解释，若作形容词论，则为“大的一统”，是对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统的状态描述，另一方面，“大”作动词用则具有“张大一统”、“发扬一统”之章，表示大一统是持续性的建构过程，它要求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完美的统一，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大一统的“大”包含着天下之“大”，国土之“大”、人口规模之“大”、事业之“大”，使命之“大”、责任之“大”、期望之“大”——大一统的精神实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大一统的效果则体现在天下归附，士人向拢，百姓望之，其实，国土之“大”与人口规模之“大”才是中国大一统最具实质性的涵义，其他都是附加衍生出来的，“大”还隐喻着大一统的不容易，“大”又可解释为“多”，把“大”或“多”归结于“一”，然后进行“统”，其难度不言而喻，“大”代表治理版图的广度和治理对象的复杂程度，如果能将“大”的国土和“多”的人口作为“一统”，会是怎样的一种国家形态呢？

（二）何谓“一”？

大一统的“一”包含着这样几个理论源头。譬如墨子说“一同天下”：“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的“一同天下”命题，就是指出天下归于一，归于统一，归于天子，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孟子与梁襄王之间对话中提及的“天下定于一”，孟子所说的“一”，既是指天下人共同尊奉的文化和信仰，也指引领这种文化与信仰的仁君圣主。梁襄王不相信仅仅“不嗜杀人”便能“一”天下，问道：“郭能与之？”谁会追随这样的人呢？孟子说：“天下莫不与也。”

天下没有不愿意追随仁君圣主的，如孟子这一段中，一句“定于一”的答词，非常有趣，而且内涵深远，是对中国政治哲学的至高原则而言，既不是指一个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说某一种方法，当然也不是光指仁或义，因为仁和义，也只是政治行为之一，是实施一种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为而已，老子也有关于“一”的论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墨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9页。
南怀瑾、《孟子旁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166页。

侯王得一以天下平，”■总的来说，“一”其实就是一套至高的治理法则定于最高之一人，定于最高之政权，定于最高之法则，也就是说，“一”标志着治理权力不分不散的至高状态。

(三)何谓“统”？

大一统的“统”首先可以做动词解，有“统一”“统合”“统治”之意，可以说。“统”是完成大一统的最后步骤，以高广度的治理版图、高密度的治理权力来降低国家系统内“无序程度*(entropy)的整合工程。

“统”也可以做名词解，有“历史之正统”“政权之政统”“继承之君统”之意，如果政权，历史，继承之君不“统”，构成一个国家之认同的过去，现在，未来三层系统的无序程度不堪设想，女真人入关后，汉人认为满清政权只有政权之政统，而没有历史之正统，而在之后的乾隆帝看来，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即大一统，故之后一直认为清朝人对大一统有重大的发明，在清朝，木兰围场和江南是分别针对边疆和内地体现整合工程的两大场域，以秋狝和联姻为纽带的“满蒙一家亲”的情境下，皇帝既是满洲之天聪汗，又是蒙古之博格达汗，清朝还通过重构《春秋》公羊学体系，克服了宋明之后遗留下来的华夏与异族对立的传统解释——“夷夏之辨”，确立清朝在历代中原王朝谱系中的正统性，在康熙、乾隆等皇帝热爱的江南不是单纯的风花雪月的地方，而是经过对以往的儒学思想整合而再生的中原之帝王与江南士人互相迎合的空间，另外，清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换来了藏族对皇帝的尊称，乃文殊菩萨的转世，清朝皇帝担任的多重身份足以降低边疆和内地的无序程度。有学者认为，大一统包括了四个不同维度：天下观、政治一统，思想一统和华夷一统——这样一种对“统”的理解

还是比较全面的，

(四)“统一”与“一统”

“统一”与“一统”这一对关系对于理解“大一统”这一概念具有关键性的地位，“统一”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政体”，尤其是指国家结构

《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9页，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李新霖：《春秋公羊传要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形式，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统”类似于我们今天讲“国体”，即政权的性质-“一统”包含着“统一”，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就是董仲舒。《春秋》是他第一个发扬光大，一统是就一统的概念产生于，

即在任何国家只能是一套政治系统，两套组织就意味着国家分裂，存在着两个政权，尽管《公羊春秋》第一次提出“大一统”说法，但董仲舒却是“大一统”最为重要的弘扬者与设计者，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推崇“一统”之意，



图4.1董仲舒与《公羊春秋》

(五)何谓“大一统”？

那么，究竟何谓“大一统”呢？的确，大一统不能割裂开来分别理解，必须将“大，一、统”三者统一在一起作整体上的理解，在复旦大学政治学学者汪仕凯看来，大一统的核心是“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就是以皇权为中心，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的政治制度体系，将大一统限定到政治大一统对于理解大一统有着重要意义，它将大一统从一种思想转化为一个社会事实，“政治大一统确实是“大一统”的核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学者杨念群看来，大一统等于正统，其还体现在时间大一统与空间大一统，同时，大一统还是政教关系的起点，其是一种超越“夷夏之辨”的国家形态，是一套复杂的政治实践，尽管杨念群对大一统的理解比较复杂，

汪仕凯：《论政治大一统：内涵，本质和演进》、《学海》2022年第5期，

但这一复杂化处理有助于我们对大一统进行整体性的全面理解，因为大一统的确是有复杂性的倾向，当然，无论是时间大一统、空间大一统，还是政教大一统，道治大一统，归根到底是政治大一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大一统等于正统，“大一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统一”，它蕴含着“元”“始”之义，具有“正”的意蕴，董仲舒将“大一统”解释为“一元”，并认为“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一语道出“一”“元”“正”这几个关键字的原初意义，最终落实于“正本”。由此可知，“大一统”是“正统”的核心概念，是中国“正统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统观”中的“元”“始”之义亦可从形而上形态扩展贯穿到世俗领域，从西汉开始，“正统论”的主题和内涵发生了一个从依赖外力支配逐渐转入内心自省的剧烈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性，儒家在这个转变中起着关键作用。杨念群认为，董仲舒把孔子打扮成有“德”却无位的“素王”，拥有“受命之符”。承担着“为汉制法”的使命，其实就是要赋予儒家辨析“正统”中“正”与“不正”的特权，为汉代“正统”思想谱系添加“正义”色彩、“大一统”中还包含着“正统”与“变统”的问题：“分”属于变统，而单纯地依靠武力获取政权也是“变统”，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必须将“变统”转换到“正统”，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提出，从定量的计算来看，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超过了统一的时间，“然而这样一种单纯时间的计算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因为“分裂”作为“变统”即使在时间意义上够长也不及“正统”的政治意义强大。况且传统中国处于分裂的时间都在历史前期，而越演进到后期大一统则日趋牢固，

“正统”的第一要义是时间的“一统”。《春秋》“隐公元年”开篇记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鲁隐公作为鲁国国君，其记载继位年号需将“王”字冠于月份之前，“王”即指周文王，这是奉周王为天下之主，昭示自己为其诸侯之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79页。

意，后面又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所有历法归周王统摄，这是从时间观上阐释“大一统”，

空间上的“大一统”可以从“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这句话体现出来，其中“一统于天下”即是从空间观上立论，空间的“一统”有大小之别，“正统”首先描摹出的是一个空间疆域不断扩张延展的状态，战国时期孟子，荀子都表达过“天下”定于“一”的思想，当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答：“定于一”，《荀子》也说“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明白指出“天下一”是地理空间的统一，秦始皇“议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李斯说“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王吉上汉宣帝《疏》，“《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些是从疆域治理的角度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治大一统反而为服装，礼乐的多样性腾出了一点空间，相反，美国在生活要素上是彻底大一统的，美国生活要素大一统的背后是标准化与资本的力量。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形成的起点，何休解读《公羊春秋》的目的在于构造上下贯通、政教合一的治理体系：“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何休所说山川草木系于正月，指的就是时空的综合，董仲舒概括“大一统”之义时也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包含了空间（“天地”）和时间（“古今”）两个维度，帝王不但统领着广大的自然地理疆域，同样也统治着人间社会，通过规定时间起始及其运行准则建构出一套政教秩序。

如果使用大一统的理论，特别是指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样的“三世说”，就能够消解夷夏之辨所关注的问题，何休创制“三世说”，以所传闻世为据乱世，所闻世为升平世，所见世为太平世，把“诸夏”与“夷狄”置于一种动态演变的论说框架之中，突破了“中国”与“夷狄”二分的诠释理路，抹掉了“夷夏”之间泾渭分明的边界，通过三世递进演化，“诸夏”与“夷狄”开放交融，从“势同水火”到“不分你我”，呈现统一而又多元的态势，杨念群认为，“三世说”体现出的历史规划图景，其

”《汉书》，班固撰，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宏阔深邃远超“中国”论述的想象力，可见，只有通过“大一统”理论，才能解释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面貌，如果不运用“大一统”的理论，而总是提“汉人政权”“五胡乱华”等概念，那么现如今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象就无法进行解释—即使是“文化中国”的概念解释力度也是较弱的。

费孝通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系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主张，最后升华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他认为中华民族不是56个民族实体的简单加总，而是56个民族结合成多元面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延续了费孝通和吴文藻早年提出的“民族平等论”的若干见解，同时又吸纳了顾颉刚在面对民族存亡危机时突出倡导“政治一体化”的合理诉求，形成一整套更为均衡合理的民族团结理论，在这里，费孝通先生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把大一统发展为开放、兼具统一性、包容性和弹性的理论，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极富有战略眼光的，纵观费孝通先生的一生，我们发现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典范，他的研究方法、学术抱负、学术使命以及政治信仰，决定了费老是现当代中国史上极为“另类”，独特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现代化程度愈高，就愈能印证费孝通先生的远见与伟大。



圈4.2费孝通及其书法

“大一统”不仅是思想意识的单纯呈现和表达，同时也是复杂的政治践履过程，是一整套统治经验和治理技术的实施方式，清朝在实践“大一统”的过程中，一方面破除“道统”与“治统”之间的截然对立关系，把本属于儒家士人的“道统”收归王权控制，实现了“道治合一”，另一方面纠正宋明新儒学排斥异族的思想谬误，鼓励知识界回归汉代经学，重新发掘出古代“正统论”中的“大一统”思想意涵，

综上所述，大一统共具有四重维度，作为原点的政教大一统，作为本质的政治大一统，作为形态的时空大一统与作为实践的道治大一统，

二、古代大一统的定律，逻辑与缺陷

通观整个古代中国发展史，我们可以提取关于大一统的定律，第一定律：分为变态，统为常态，第二定律，自上而下，层级越低，统的力度越弱；第三定律：一朝代越到后期，统的力度越减弱；第四定律：定都离北方越远，离南方越近，统的力度越弱；第五定律：汉人政权大一统的力度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之大一统的力度高，为什么会出现诸如类似的定律吗？这要从基于郡县国家的大一统的逻辑与缺陷中寻找缘故。

我们知道，大一统的基础在于郡县国家的确立，按照曹锦清先生的看法，“郡县国家”有四大支柱：中央集权为核心导向、文官制度为中层支撑、乡土自治为基层设计、行政区划为技术保障，①《史记》中曾云：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至此，由中央政府统辖全国地方的郡县国家便作为历史的常态确立下来了。尽管从过程来看，郡县国家的成长和真正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秦始皇的确是确立了中国国家成长的制度起点，所以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说：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曾发出“百代

曹锦清：《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

。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都行秦政法”的感叹，在秦始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中，由郡县制支撑的大一统，无疑是影响最为深重的，

钱穆曾言：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面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钱穆先生又进一步指出，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竟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堪称奇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归纳了人类迄今为止出现过的21种成熟文明”，在第一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绵不绝、持续至今，在中国文明的延续过程中，以“大一统”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建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之轴”。大一统不仅贯穿于中国政道理想之始终，而且也促成了中国独创性的政治实践，导致与欧洲几乎面积相当的中国，避免了根本性分裂，维持了国家统一和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

郡县国家大一统的内在逻辑在于文化与制度的相互贯通，一方面，大一统具有很强规范性意义，代表着一种政道理想，另一方面，大一统又是作为一种客观政治秩序而存在，大一统的复合性可以展开为文化系统(价值)和政治制度(工具)两个层面，它们构成了其生产和维系的两大前提条件，将郡县国家的大一统从理想转化为政治现实。

一方面，价值层次的文化系统，规定了大一统的合法性，为社会成员追求大一统提供了充分心理动机。有助于支持大一统的文化资源主要存在两类，第一，是具有日常生活属性的认同性符号，它们包括法律、货币单位，语言和书写文字的标准化等，这减少了不同地域的民众对彼此差异性的认知，潜意识地培育出集体认同，例如，汉字的统一就具有重要的国家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引论，第23页。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租：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58052037033007003>